

以媒介全景观看《人民的名义》

■张涛甫

近日,反腐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火爆得很,它不仅霸占了影视屏幕,也在网上被疯狂刷屏。此前有火爆的电视剧,但火爆的受众面积没这么大,受众结构也没《人民的名义》这么多元,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可谓老少咸宜,青黄通吃,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,如此宽广的影响面,在近十多年的影视收视历史上也许是罕见的,尤其是在电视媒体的运势江河日下的今天,如此热气腾腾的收视盛况,的确是一个奇迹。随剧同热的,还有同名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。这似乎不意外,很多热播电视剧和当红电影,热度所及,也把小说给带火了。

这次围观《人民的名义》的,有很多是年轻受众。这些平日不大关心政治、喜欢宅在自己小世界里的90后、00后们,参与这次追剧大潮,让我们对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刮目相看。他们的追剧方式也很新潮,粉丝团、弹幕、表情包等等,这种新媒体化的追剧方式激活了传受关系,将原先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直观地呈现在收视现场,而且,网络收视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,观看场景移动化,随时随地可以观看,如此便捷的



反腐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海报

观剧方式,给《人民的名义》的火爆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。

反腐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受到广泛且热烈的追捧,究其原因,盖有三点:

一则,反腐窗口期的接受期待。反腐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态中的灼热话题,公众关切度高。只要是反腐话题,无论大小巨细,围观者甚众。但是,反腐信息的供给相对不足。与公众的热切期待比较起来,反腐信息的供给还显得不解渴。这倒不是因为涉腐的老虎苍蝇不够多。十八大以

来,中央以雷霆之势反腐,苍蝇老虎一起打,甚至位高权重的国家级“大老虎”,也在被打之列。如此凌厉的反腐力度,应声倒下的腐败分子规模实不可谓不大。与此同时,有关反腐的新闻也不断刷新。但以新闻方式出炉的反腐资讯,由于过于简洁,因而满足不了被反腐现实刺激起来的公众需求。《人民的名义》出现在这个市场节骨眼上,卡位精准,切中社会的痛点。

二则,“超现实”的文学呈现。在丰满的现实生活面前,作家和

艺术家的才华难免会黯然失色。有言道,艺术来源于生活,却高于生活。这在生活不那么复杂而艺术又有极高的洞察生活、再现生活能力的情况下是可及的;但当生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大于艺术的表现力之时,艺术就显得吃力和紧巴了。面对“超现实”的骨感现实,多数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往往跟不上。只有少数才华卓越者方能胜任。周梅森则是这少数中的一员。他的敏锐和精确洞察,以及举重若轻、洞幽烛微的现实表现力,是当下中国多数作

家难以望其项背的。在驾驭“反腐”题材上,周梅森可算是“男一号”了。周梅森笔下的人物与社会立体、丰满、有厚度,这在其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中表现甚为显豁。周梅森的描述没有脸谱化,而是将职场生态、人性以及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盘呈现出来,写出了深度,把人性的丰富和幽暗大尺度地发掘出来。正因有了小说的深度和精度,才为后续的影视再创作提供了的文本准备。

三则,成功的影视再生产。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是根据周梅森的同名小说的再创作。电视剧编剧仍是周梅森。从作家到编剧,这个角色转换对于周梅森来说,并非难事。但剧本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电视剧的成功。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看演员的功夫。这次,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集结了豪华阵容,老戏骨们组团出演,充分展示了演艺界的中国功夫。一个个老演员的表演功力着实了得,将人物演活了。赵德汉、李达康、高育良、祁同伟等角色的演绎,显然不是单靠颜值能担当的,拼的是实力和硬功;相比之下,饰演侯亮平的陆毅,只能靠颜值开路了。正因有这么多实力派演员的二度创造,让原先潜藏在文字里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鲜活地出现在荧屏上。演员们的出色演绎将《人民的名义》推送到观众面前,成就了眼下的收视奇观,也才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媒介景观的全景。

随意春芳歇

——辛德勇新书读记

■王贺

奉到辛德勇老师的新著《那些书和那些人》(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)已多时了,一直腾不开手眼。这绝不是敢有意怠慢,而是因为,作为学术界的“农民工”,白天要看资料写论文,晚上还要收发邮件处理杂事,时间真不够用。就这么拖了又拖,直到最近,才在夜深人静之时,拿小刀一边裁,一边读。雅固然雅极,但不免读得缓了,有点烦。不记得哪位高人说过,凡书皆应置备两册,一册普通装阅读,一册毛边本收藏。我不是“毛边党员”,也没有浮财购、藏书,读书只以实用为主,闻此不免惺惺相惜。

但读毛边本既然较慢,不期然也就有另外一个效果,那就是逼着自己相对读得比较深入、细致一些。从《自序》一路往下,除了极少数几篇学术性质的文章(也并不难读,至少我自己读得津津有味),集中其于所收,大率散文、随笔之什,而散文、随笔的妙处,或正如东晋名士殷浩所言,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当代如汪曾祺、钱谷融等先生,都很喜欢引此作为自己写作的理由,诚其然也。透过全书所收散文、随笔,辛老师的研究心得、学思历程乃至学术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(多半仍以“书”为中心)、个人性情等等,仿佛也就看得更加明白一些了。

怀人之作是此书的一大方面。为辛老师所记叙的人,大多都很平凡。其中既有他的父亲、恩师、旧友,也不

乏有过交道的书商、一起“淘宝”的书友,以及求学及后来在社科院、北大工作时期的老师、同事。写恩师黄永年先生的两篇文章我最有兴趣。尽管黄先生的著作,如研究中古政治史者,以过于专门,我没有通读,但有几种,读得很熟,有一种甚至是在侍陪爸爸住院期间读完的。辛老师写黄先生的文章,断断续续也读过一些,这次读收入此书的另外两篇,更对黄先生那种虽处涸辙仍能“游于艺”的境界,产生一种从前未有的感动。将此与傅杰学长记黄先生一文合观,感触尤甚。的确,哪一个适合做学问的“黄金时代”在前面等着我们?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或能够帮我们“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,“放”我们“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?”但没有就不做了吗?整天怨东怨西,有济于事吗?

但也照例写到很多古书、旧书。除了那些好不容易淘来、或是和友人交换得来的宝贝,至如论及《新五代史》《二十四史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等,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,写得比较随意,但每一篇几乎都有新的见地和论证。其实,熟悉辛老师的读者都知道,印刷出版史、书籍史研究,尤其古籍版本,是他的专长。他的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,也就是从自己收藏、拥有的实物、原书出发,由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出发,而上下左右,旁征博引,解开学界许多聚讼纷纭的谜

团。在这方面,他不仅贡献了诸多专精的研究,哪怕是一纸小文章,也能给我们不少启发。可怜我们做近现代文史、文献一行的,还要被前辈不断苦口婆心地提醒:一定要见原书啊!至少要见书影、见图录啊!

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书事。比如《书商梁永进》一篇,述及自己和中国书店的梁永进先生的交往,让人感触很深。有一回,应梁先生邀请去张家口讲座,讲完后,梁坦白说自己不像公家单位,开不出讲座费,只得用书作酬,辛老师不仅痛快地答应,而且慨乎言之:当年在社科院兼任一核心期刊主编,到处有人邀请讲学,但以学问荒疏,统统谢绝,后来调到北大历史系,潜心数载,自觉有了不少心得,却无人邀约。也许,此即“现实一种”,现实真正比小说还要精彩。

去年岁末,一文初成,再请辛老师指教,他在病后调养身体之余,给我提供了非常专业的评论,当然,顺带着也毫不犹豫地赐予一通严厉的批评。可能我由于一向比较粗线条的缘故,不仅心悦诚服,而且,闻过则大喜。他的做法,也让我想起了另外几位时常鼓励、支持但也不忘“修理”我的老师。这样的老师们,要是多一点,我们的学风是不是会更端正、质朴一些?研究所得的成绩是不是会更多、更大一些?不敢说。至少我自己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很多为人为学的经验,无任感荷之至。

这样想着的时候,有人突然跑来说:王兄,闵大荒的樱花开了!竟也懒得去赏。赏花思春,睹物思人,打开荧光幕而思论文之劳神。如此纷纷情欲,既已无法抖落,又有人间诸事,频频相扰,何如观书喜悦自在呢?

简·奥斯汀的再见

■梁永安

为一本书稿选电影目录,好电影太多,难割难舍。《成为简·奥斯汀》却毫不犹豫,一定保留。

影片末段,简和汤姆·勒弗罗伊私奔,途中知道,他将失去自己将要继承的一切,还要负担很多家人的生活。简绝望了,她和勒弗罗伊有了一番悲切的深谈:

简:是的。但如果我们的爱能毁掉你的家人,它也会毁掉自身!

汤姆:不!

简:会!它会在内疚、悔恨和自责中慢慢消亡。

汤姆:胡说!

简:是真相,从矛盾中显示出来的真相。我们要微笑着接受它,否则我只能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相爱过。

汤姆:请别这样……

简:再见。

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水落石出的对话,男女的分野,像打开的山谷,裸露出截然不同的地心。

简·奥斯汀是个细润的写作者,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初稿写于二十一岁。为什么不能毅然做一个“在路上”的女作家,与相爱的人一道,在一无所有中创造别样的生活?男性永远不能问这样的问题,更不能像汤姆·勒弗罗伊那样毫无准备。漂泊的女作家世代代都有,但那只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,赫塔·米勒、林芙美子、大卫·妮尔、萧红……

多年前曾得到一本冰心的散文集《拾穗小札》,1962年出版,封面素淡。里面有一篇,写到俄罗斯访问,看到当年列宁藏身山林,写出了《国家与革命》的那个树桩。冰心十分惭愧,说自己写作时一定要窗明几净,在暖馨的书房里才安心。大概世界上的作家无论男女,都可以分为两种:属于书房的和属于路上的。到底能走哪条路确实要想清楚,不然坐在书桌前想路上,走在路上想书房,一辈子彷徨。简·奥斯汀很明白,所以告别很果断,虽爱不流连。